

美國之音訪問稿

關於在葡萄牙召開的歐洲漢學會議上，大陸漢辦主任強迫會議籌備人撕毀有蔣經國基金會字樣書頁的事件，我已經從友人寄來郵件，知道了大概情形。在中文媒體上，也有報導。在英文媒體上，卻是至今為提此事。此間英文媒體卻登載過，美國若干大學，對於孔子學院的政治化，有相當的意見。

漢辦主任在葡萄牙的言行，我的初步反應是詫異；接著是覺得可笑；最後為中國政府悲哀：覺得堂堂大國的文化官員，居然有此種作風，難道中國的政府，找錯了人？或者，定錯了政策？在世界都以為中國崛起時，這種作風，難免世人會當作笑柄。

所有有關文化的學術研究，都將各種個別文化系統，視為人類文化的一部分。各處人類創造和累積的文化，乃是人類共有的遺產。這份遺產，作為研究對象，沒有任何人能權利，聲稱獨占的“專利”。研究人類文化的學術單位，或個別學者，可以接受各方支持。但是，任何支援，都不應附帶條件，要求研究者遷就其預設的意見。

學術研究本身有一定的規範，最重要的規範，就是不作預設的假定，更不作預設的結論。不管人文學科的研究，或者自然學科的研究，這一個規範無不為學術界一致遵守。學術本身，是尋找研究課題的真相，而且盡我們能力所及，用各種方法檢驗和核對，以防止因為自己的有色眼鏡，而終於矇蔽了能夠覺察真相的能力。學術研究，乃是以清明理智，按照合理的邏輯思維，慎思明辨。狹窄的民族情感、階級利益、政治主張、性別立場，都會造成預設的立場。只要有其中之一，學術研究不能找到真相。

世界之大，學術範圍之廣，沒有人能一手遮蔽天下的耳目。正如大家熟知的格言：「沒有謊言能夠欺騙所有的人，也沒有謊言，可以永遠欺騙人。」

我個人盼望，中國政府既然正在進行改革開放的大業，無論是黨和政，當局者都應當告誡他們的屬下，尤其在國際場合，中國的威權無法達到的地方，不要將過去的舊習慣，再次暴露在世人審視的眼光之下，引起世人對中國改革開放宏業的訕笑，以致傷害了改革開放宏業的信譽。

== ==

關於蔣經國基金會，其全名是「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」，很多人因為「蔣經國」的名字，以為這是個政治性的學術基金會，其實，遠在他故去以前，學者們就已經在討論，設計這一類基金會。1970年代中期，台灣經濟已經相當富裕，當時行政院長孫運璿先生，幾乎每年都召集海內、外的華人學者，到台灣開會，提供建設台灣的意見。當時正時大陸上，文革進行之時，很多人看見文革造成對於中國文化的摧殘，都十分傷心：既擔憂文物的破壞，更痛心學者的被迫害。為了要補救中國文化研究難以補償的損失，許多同仁們覺得，只有在大陸以外，多發動學術界的人才，對中國文化的各方面，加強探討和研究。台灣的人口有限，學術界能夠騰出的人文社會範圍科目的研究人才，數量不足以負擔對中國文化全盤研究的重大任務。於是，一些朋友們，覺得必須要發動國際上從事中國研究的資源，共同進行這一個重大的任務。既然台灣經濟已經在成長中，台灣應當盡一份心力，擔起支持這一國際學術事業的一部份支援工作。

基於這一個想法，我們在國建會上，已經有相當多的朋友們，取得共識。我們也和孫院長等有關的政府官員，交換過意見。有的人認為，可以由政府撥出資金，創辦一個基金會。但是我自己和一些朋友們，卻覺得，這一類工作，不應是政府的業務，而應當是由民間作為主要的力量，以避免任何政治力量的影響。

八零年初期，我們在美國的一些朋友，藉亞洲研究會議的場合，分別和其他的華人學者接觸，聽取大家的意見。大約1984年左右，我和一些朋友們，在亞洲研究年會上，收集了參加年會的數十位華人學者的簽名。我回台時，將這些意見書，送給當時的教育部長李煥看。由他向蔣經國總統報告。我也因此和蔣經國總統當面作過解釋：蔣總統對如此意見非常重視，而且，他也提出自己的主張：自從義和團之亂，中國付出賠款，美國和歐洲若干國家，陸續將賠款設立基金會，幫助中國發展教育。中國抗戰時期，美國曾經幫助我們度過最困難的難關。世界對中國曾經有如此的幫助。他以為，現在台灣的中國人，既然已經具備助人的力量，就應當對世界有所回饋。他也同意我的意見，以為研究中國文化，確實是世界性的事業，其意義超過「中國」。中國人應當作，更應當鼓勵其他國家的學者，與我們共同合作，對這個偉大、豐富的中國文化傳統，取得更多的了解，也有更進一步的闡釋，使未來的全球文化，貢獻中國的成分。

1988年，蔣經國總統逝世，台灣政府和民間，都在討論如何紀念，這一位對台灣的改革開放，有重大貢獻的人物。李煥先生特別提出：紀念碑、紀念堂等等，都不能永遠存在，也沒有具體的意義；既然蔣經國總統曾經贊許，設立基金會的構想，李煥先生建議：就設立一個「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」，以落實蔣經國先生的願心。於是，蔣經國先生同事和朋友們，邀約幾個學術界的人士，共同討論如何進行。當時我代表同仁們的建議，這一個基金會，主要的資金來源，應當是來自民間，但是如果政府出一部分「種子錢」，作為倡導，當有鼓勵民間出

資的作用。當時的教育部長，毛高文先生，盡力設法，捐出一筆“種子錢”，登記為民間的財團法人。在政府出了第一筆捐款後，民間果然踴躍捐贈，一年之內，就到達相當的數字，其中民間部份遠大於政府的捐款。

1989年，基金會開始運作，最初只在北美地區接受申請案，陸續擴大到歐洲、亞太、和港台地區。各處的運作方式和原則，基本上是一致的。這個基金會的運作，完全脫離政府影響，是由經國先生的友好，幾位捐款數字較大的企業家，再加上八、九位學者，共同組成董事會。第一任董事長是募款最多的李國鼎先生；執行長是李亦園先生，一位人類學家。基金會的運作，董事長主持董事會會議，所有的決策和執行，則由執行長負起最大的責任。我自己是董事之一，也負責基金會在北美地區的運作。因為我居住匹茲堡，所以基金會在華府的辦事處，有一位年輕學者李興維擔任主任。我們還聘請一位美國退休的外交人員，丁大偉先生，擔任顧問，為我們聯絡美國有關各方，使美國社會和學界，充分理解蔣基會的工作旨趣。蔣基會在美國的工作，遂得迅速展開。

我們每年接受美國各大學中國研究單位、個別學者、與學生的申請：支援學校強化中國研究的教研實力，幫助學者們的研究計劃、舉行學術會議、和發表研究成果。為了審查這些申請案，蔣經國基金會聘請在北美的華裔學者，組成四、五個小組，每個小組三個人，每三年輪替三分之一，以保持廣泛的代表性，和對於各種年齡群的了解。這個審查委員會推薦的補助案，每年三月，送回總部，由董事會核定，二十五年來，董事會沒有對我們的推薦案，有任何的意見。二十五年來，我們秉持純學術的原則：不考慮國籍、性別、膚色、族群、信仰等等差異。我們只考慮到每一個申請案本身的學術意義、價值，和該案在許多申請案中的相對優劣。此外一切，都不在我們考慮之內。開始運作之初，曾經有兩次，美國的國會議員，想要經過台灣駐美外交單位，為他們本州學校的申請案關說，都被我們擋回。有些大學，也曾經以為我們應當有鑑於各該大學的「崇高地位」，而予以優先考慮，也被我們直言駁回。至今，二十五年來，在北美地區，蔣經國基金會支付了總數不下四千萬美元，支援北美的中國研究；全球各地，蔣經國基金會支付的補助款，則已達一億四千萬美元左右。（詳細數字，我要查檔案才能知道）。

我作如此詳細陳述，正是回應美國之音的訪問，說明我們的做法，完全不同於那位漢辦主任擬想的方式。這一說明，請您傳達給美國之音的聽眾，謝謝。至於，中國大陸的漢辦，今天和此後如何辦事，我們無法干預；我只是盼望，他們應當對學術界的規範能有明白的了解，也尊重學術界的這一可貴的傳統。